

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意愿与可持续

生计资本的关系研究

——基于鄱阳湖区的调研数据

雷菁 刘影 高良庸¹

【摘要】长江流域禁捕是我国资源生态保护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是保护长江母亲河并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通过对鄱阳湖区渔民退捕意愿和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实地调研，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渔民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渔民退捕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对退捕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的结论。建议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加大创业扶持、加强技能培训、开发公益岗位来提升渔民退捕后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确保长江大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长江流域 禁捕 渔民 生计资本 退捕意愿

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也是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然而，过去几十年快速、粗放的发展模式令长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受过度捕捞、无序开发等各种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长江水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基本丧失捕捞生产价值，形势十分严峻。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为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决策部署，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2018 年又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2019 年农业农村部等三部委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工作做出了明确部署和要求。长江禁捕工作涉及渔民渔船多，覆盖区域范围广，是我国资源生态保护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涉及长江沿线 27 万多捕捞渔民的切身利益^[1]。渔民作为渔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其退捕意愿是禁捕工作能否顺利实施和推进的根本保障。因此，研究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意愿，妥善解决禁捕后渔民的可持续生计，是推进长江禁捕工作顺利实施的重中之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可持续生计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 Sen 及 Chambers 等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为理解与解决复杂的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法，被广泛用于南美洲、非洲、中东欧以及亚洲等地的扶贫开发和生计建设项目实践中。近年来，随着可持续生计研究方法的不断开展和完善，它也被广泛运用于应对贫困、脆弱性、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气候变化适应以及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复杂突发事件、冲突与灾难的响应等方面。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理论，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了一种规范化的工具和系统化的思路，已有研究大多基于该框架评价生计是否可持续^{[2][3]}，即查考人们是否有能力解决与确保他们未来的生计。例如，Paul 等从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及社会资本出发，评价了印度轮作林农的生计可持续性，指出社会

¹作者简介：雷菁，江西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生，研究生院学位办主任。（江西南昌 330022）

刘影，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江西南昌 330022）

高良庸，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硕士生。（江西南昌 330022）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禁捕实施后鄱阳湖渔民可持续生计转型的对策研究”（21GL09）

资本与金融资本对林农轮作的生计可持续性非常重要。^[4]在国内, 地理学、环境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已成为开展可持续生计研究最活跃的学科。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农户可持续生计逐渐形成了很多研究热点, 有农户生计脆弱性分析、农户生计评价指标构建、农户生计风险应对研究、生计资本研究、生计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等。

国内外有关可持续生计和农户生计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但关于渔民可持续生计的讨论和研究较少, 特别是国外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国内的研究大多继承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成果, 主要有: 吕建华等通过分析围海造地管理中失海渔民现状, 来探究解决失海渔民利益补偿问题的路径。他提出, 维护因围海造地而失海的渔民的基本权益需健全完善统一的利益补偿法规, 并建立多种长效的利益补偿机制。^[5]朱晓莉等分析了影响渔民转产就业的因素。^[6]鲍谦等从政府、社会、个人等方面概括了渔民“失海”的五种常见类型, 分析了渔民生计难以持续的根本与直接原因。^[7]鲍谦等对中国“失海”渔民的生计现状进行了分析。^[8]殷文伟等认为, 政府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渔业的平稳发展和渔区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在压缩捕捞强度和保障失海渔民切身利益方面的效果不甚明显, 有待进一步完善。^[9]张兴祥通过分析厦门市第一产业的变动情况和城市化水平, 就失海渔民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 对渔民转产就业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10]赵景辉等通过分析渔民增收放缓的症结, 提出通过“进”“退”结合、“权”“利”转化、“质”“量”共管、“减”“扶”并进、“内”“外”兼顾等多措并举的方式来建立长效的增收机制。^[11]董晓清以江苏省沿海开发为例, 分析了渔民在可持续生计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并探索了失海渔民可持续生计路径。他指出, 完善征海程序是突破困境的基础, 加强技能培训是突破困境的关键, 发展休闲渔业是突破困境的桥梁, 健全保障体系是突破困境的核心。^[12]

总之, 国内外现有相关成果不乏精品力作, 为本研究提供了知识积累和理论资源, 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聚焦渔民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不足, 尤其是对政策原因引起的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关注甚少; 二是现有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 定量研究较少, 关于渔民生计的研究方法多集中于社会学方法和政策性描述, 缺乏基于实地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 三是渔民生计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应运用多学科思维、方法及模型进行综合性分析,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学、管理学等单一学科层面, 而结合地理学思维、经济学思维等相关研究较少。

鉴于此, 本文从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的角度, 通过对鄱阳湖区鄱阳县和余干县 228 户渔民的实地调研, 采用 DFID 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对渔民生计资本进行定量评估, 并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渔民退捕意愿与生计资本的关系, 从而为鄱阳湖渔民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以及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提供科学依据, 也为其他区域退捕渔民生计转型提供借鉴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区域概况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中北部, 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通江湖泊, 又是我国淡水渔业种质基因库和重要的淡水渔业生产基地, 更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鄱阳湖湖区有 300 多个渔村, 超过 10 万名渔民。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统计, 2018 年全湖渔户约 2.9 万余户, 渔船 2.8 万余艘, 其中鄱阳县渔船数量为 5600 余艘, 渔户 6200 余户, 渔民 13200 余人, 渔船、渔户、渔民的数量均为全湖区第 1 位; 余干县渔船数量为 5600 余艘, 渔户 5600 余户, 渔民 11300 余人, 渔船数量和鄱阳县相同, 渔户、渔民均为全湖区第 2 位。两县相加, 渔船数量占全湖区 49.95%, 渔户占全湖区 47.86%, 渔民占全湖区 46.90%, 因此, 本研究选择鄱阳县和余干县开展专题调研,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数据来源

鄱阳湖区的各县渔船、渔民、渔户数据来源于 2018 年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局的统计数据。渔民生计数据是研究团队通过 2019 年 7—8 月的野外调查获得。调查地点主要是 2 县(余干县、鄱阳县) 4 乡镇(康山乡、莲湖乡、白沙洲乡、双港镇)。渔民生计数据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获得, 调查对象均为以捕捞

为生的渔民。问卷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五大生计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设计完成。问卷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1）渔民的5种生计资本情况。人力资本包含渔民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自然资本包括渔民的捕鱼量、渔民是否有捕捞证和渔民对所在湖区鱼量的评估；物质资本包括渔民房屋情况、渔船与渔具的种类和数量及家庭固定资本；社会资本包括渔民的亲戚数量、亲戚朋友的关系及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属于事业单位或公务员系统等；金融资本包括渔民的捕鱼收入、获得政府补贴及获取信贷的来源。（2）渔民对禁捕的态度及对政府补偿方式和标准的认可度，以及需要政府提供的支持。（3）禁捕后所担心的生计风险。问卷共发放228份，收回214份，问卷回收率达到93.9%，所有回收问卷均为有效问卷。

（三）研究方法

1. 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

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农民生计研究。^[13, 14, 16]研究团队通过随机访谈、直接观察、调查问卷、半结构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在每个调查的村庄，首先与村领导、有声望的老人等关键人物进行访谈，了解渔民的基本生活状况和捕鱼状况；随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渔民进行问卷调查。

2.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16][17]}是将原始数据通过客观的数理统计计算，最后得到权重，与多准则决策分析法相比，该方法克服了人为因素的影响，更具有客观性。

3.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是一种广义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常用于数据挖掘、疾病自动诊断、经济预测等领域。根据因变量取值类别不同，logistic 回归分析分为二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农户是否自愿退捕，只有自愿、不自愿2种情况，所以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设Y为因变量，当Y=1时，表示渔民自愿退捕；Y=0时，渔民不愿意退捕，影响Y的5种生计资本作为自变量，分别为人力资本X1、自然资本X2、物质资本X3、社会资本X4、金融资本X5。

三、鄱阳湖区渔民生计现状

（一）从渔民数量看，规模庞大、层次分化

根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调研统计，鄱阳湖湖区渔民总户数约2.9万户，人口总量约12.5万人。其中，有捕捞证渔民占渔民总人数的70%；从事一线作业的渔民多在30—60岁之间，又以45—55岁年龄段居多，占总人数56%；渔民整体文化水平偏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总人数的89.4%；除宅基地外，绝大多数渔民“岸无寸土”，高度依赖水面作业维系生计。

（二）从渔民收入看，整体微薄、来源单一

根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调研统计，捕捞收入是渔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渔民家庭年收入9.6万元，其中捕捞收入6.7万元、打工收入2.6万元、燃油补贴收入0.34万元，少数渔民还有一些其他生产经营收入。捕捞收入约占渔民总收入的65%以上。近年来，随着鄱阳湖天然渔业资源的日渐枯竭，捕捞难度和成本不断增大，对渔民的收入总量影响较大。如遇极端气候年份（如2018年大旱），户均收入较往年减少1/3以上，造成入不敷出。近些年来，渔民捕捞品种发生了深刻变化，小龙虾、青虾等已经成为渔民主要捕捞对象和经济来源，占渔民捕捞收入60%以上。

（三）从渔民社保情况看，体系单一、参保标准低

根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调研统计，在社保缴纳方面，仅 5%左右的渔民购买了企业养老保险，60 岁后每月可以领到 1000 元左右，95%以上渔民购买的是 100 元/年的“新农合”社保和 300 元/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60 岁后每月仅能领到 141 元的养老金。此外，由于长期亲水作业，渔民普遍患有重度风湿等慢性疾病。受制于有限的医保报销比例，因病致穷、因病返穷现象层出不穷，社保养老取代养儿防老在现阶段仍不现实。

四、渔民生计资本对退捕意愿的影响

（一）受访渔民生计资本状况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 5 部分。^{[18] (P16-18)} 参考国内外学者关于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渔民自身的特征，最终选取了符合渔民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的指标体系。

人力资本代表着劳动能力、健康、知识和技能，这取决于家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到其他 4 种生计资本的利用，因此是其他生计资本的基础。对人力资本的测算选择劳动力能力和质量两个指标：劳动能力是指渔民家庭劳动力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对不同年龄段的渔民进行赋值；劳动力质量指渔民的受教育程度，对不同受教育阶段的人进行赋值。自然资本是指自然界中自然资源的储量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对渔民而言自然资本则是捕鱼量以及对湖区鱼量多少的评价。专业渔民没有耕地，故选择捕鱼量、鱼类资源量和有无捕捞证作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主要是维持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本研究选择住房情况、渔船种类、渔船价格、捕鱼工具价值和固定资产作为衡量标准。社会资本是人们追求生计目标所利用的社会资源，本研究选择与亲戚朋友的关系、家庭亲戚数量和家庭成员的工作情况 3 个指标。金融资本是指渔民所获得的资金收入和可筹措的现金。考虑到渔民的实际情况，选择劳动收入、国家补贴及在需要帮助时筹集资金的方式作为衡量指标。具体的生计资本指标体系和计算方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渔民生计资本评估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符号	指标计算公式
人力资本	家庭人口劳动能力	H1	$H1 = (H11 \times 0 + H12 \times 0.6 + H13 \times 1 + H14 \times 0 + H15 \times 0) / \max(H1)$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H2	$H2 = (H21 \times 0 + H22 \times 0.25 + H23 \times 0.5 + H24 \times 0.75 + H25 \times 1) / \max(H2)$
自然资本	捕鱼量	N1	$N1 = \text{实际每户捕鱼量} / \text{调查户最大捕鱼量}$
	有无捕捞证	N2	设定二分变量，有则赋值为 1，没有则赋值为 0
	鱼类资源量	N3	非常丰富 1，比较丰富 0.75，一般 0.5，较少 0.25，很少 0

物质资本	住房情况	P1	$P1=(P11+P12)$
	渔船数量	P2	$P2=每户实际拥有量/调查户最大拥有量$
	渔船价值	P3	$P3=每户渔船价值/调查户最大渔船价值$
	渔具价值	P4	$P4=2 \times 渔具价值/调查户最大渔具价值$
	固定物质资产	P5	$P5=每户拥有固定资产数/调查户最大拥有数量$
社会资本	与亲戚朋友关系	S1	非常融洽 1, 融洽 0.75, 一般 0.5, 不太融洽 0.25, 糟糕 0
	亲戚数量	S2	$S2=每户亲戚数量/调查户最大亲戚数量$
	是否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亲戚	S3	设定二分变量, 有则赋值 21, 没有则赋值为 0
金融资本	劳动收入	F1	$F1=每户劳动收入/调查户最大劳动收入$
	国家补贴	F2	$F2=实际补贴数额/调查户获得最大补贴数额$
	筹集资金来源	F3	$F3=每户筹集资金方式/调查户最多筹集资金方式$

注: 1)H11 为 16 岁以下的孩子, H12 为 16-20 岁的劳动力, H13 为 20-60 岁男性成年劳动力和 20-55 岁女性成年劳动力, H14 为 60-70 岁男性成年劳动力和 55-70 岁女性成年劳动力, H15 为 70 岁以上的老人, 其中残疾人均为 0。2)H21 为文盲, H22 为小学受教育程度, H23 为初中, H24 为高中, H25 为专科及以上学历。3)P11 为住房种类: 钢筋混凝土房为 1, 砖木/砖瓦房为 0.5, 土木房为 0.25。P12 为住房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为 1, 200-300 平方米为 0.75, 100-200 平方米为 0.5, 0-100 平方米为 0.25。

利用熵值法, 运用 Excel2013 软件进行处理计算, 得到生计资本总值。如表 2 所示, 分别为自然资本 (0.4347)、物质资本 (0.3859)、金融资本 (0.3631)、人力资本 (0.284)、社会资本 (0.2289)。

渔民没有耕地只能依靠捕鱼为生, 因此对自然资源依赖性很大, 除捕鱼外并没有其他技能, 收入来源单一, 因此自然资本最高。社会资本最低, 这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 渔民的文化程度低、社交网络欠发达等, 使渔民的交际圈范围仅限于亲戚朋友, 加之渔民世代捕鱼, 工作的区域仅限于鄱阳湖等周边区域, 这就容易导致渔民获得信息渠道少, 信息资源弱, 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最终导致社会资本低。其次, 人力资本值也较低, 主要是因为渔民的年龄大和受教育程度低造成的。据调查, 鄱阳湖渔民的平均年龄为 51.5 岁, 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小学或文盲, 这就造成渔民的劳动能力不高, 限制了渔民生计策略转变途径, 造成渔民只能依靠单纯的劳动力获得收入, 直接影响到渔民的可持续生计发展。

表 2 渔民生计资本测量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符号	权重	指标值	生计资本值
人力资本	家庭人口劳动能力	H1	0.4313	0.2640	0.284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H2	0.5687	0.2991	
自然资本	捕鱼量	N1	0.3720	0.2443	0.4347
	有无捕捞证	N2	0.1648	0.8785	
	鱼类资源量	N3	0.4632	0.4299	
物质资本	住房情况	P1	0.1377	0.8224	0.3859
	渔船数量	P2	0.1452	0.4372	
	渔船价值	P3	0.2188	0.3227	
	渔具价值	P4	0.3989	0.2136	
	固定总资产	P5	0.0994	0.5364	
社会资本	与亲戚朋友关系	S1	0.0542	0.7850	0.2289
	亲戚数量	S2	0.0946	0.3720	
	是否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亲戚	S3	0.8512	0.1776	
金融资本	劳动收入	F1	0.3141	0.2674	0.3631
	国家补贴	F2	0.4309	0.3785	
	筹集资金来源	F3	0.2550	0.4548	
总计					1.6966

（二）受访渔民的退捕意愿

渔民的退捕意愿与自身拥有的生计资本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讲，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影响渔民退捕意愿的重要因素。不同地区的渔民自愿退捕与否的情况相差很大。其中，余干县康山乡渔民不愿意退捕的比例最高，达 87.5%，愿意退捕的仅占 12.5%；鄱阳县莲湖乡渔民自愿退捕的比例最高，达到 64.3%，不愿意的占 35.7%；鄱阳县白沙洲

乡渔民不愿意退捕的占 66.7%，愿意的占 33.3%；鄱阳县双港镇渔民是否愿意退捕双方的比例相差最少，愿意退捕的渔民占 54.8%，不愿意退捕的占 45.2%。这与渔民自身的生计资本状况相关。

（三）退捕意愿与生计资本关系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对模型进行拟合得到：Coxand SnellR 方值为 0.561，NagelkerkeR 方值为 0.754，R 方值越大模型拟合效果越好，整体讲模拟效果较好。以 5 种生计资本作为变量与因变量（渔民退捕意愿）进行线性相关分析，得到 5 种生计资本关联性强。因此选择 5 种生计资本作为变量。报告了模型中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值、标准差，各变量采用多分类型，均值表示该组数据集中趋势的指标，标准差反映的是一组数值的离散程度。一个较大的标准差，代表大部分数值和其平均值之间差异较大；一个较小的标准差，代表这些数值较接近平均值。从中看出退捕意愿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成正相关，与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呈负相关性。各变量的显著性强。

2. 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渔民的退捕意愿与五大生计资本的关系。借助 SPSS19.0 中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块，采用进入法分析渔民退捕意愿与 5 种生计资本的关系。 β 表示回归系数，S.E 表示标准误差，Wald 表示统计量，df 表示自由度，sig 表示显著性水平， $\text{Exp}(\beta)$ 表示发生比率。表中 β 值为正，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呈正相关性，反之为负相关性。Wald 统计量越大，则表示该变量更加重要。Sig 值越小，则进一步证明该变量所呈现的相关性更加显著，影响程度越高。

从中看出五大生计资本的 Sig 值均低于 0.05，说明每种生计资本都与渔民退捕意愿密切相关。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相关系数为正，说明与退捕意愿呈正相关；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相关系数为负，说明与渔民退捕意愿呈负相关。

人力资本与渔民退捕意愿呈正相关性，显著性较强。说明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渔民更容易自愿退捕，这是因为随着人力资本增大意味着家庭中劳动力数量更多、渔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年龄更接近劳动力旺盛时期，渔民从事非捕鱼劳动的可能性就会越高，收入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渔民要求劳动力转移的愿望也就越高，也就更加自愿退捕。

物质资本与渔民退捕意愿呈正相关性，显著性极强。对渔民而言，拥有更多的物质基础是自愿参与退捕的重要因素，因为当渔民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时其所承受的失败压力就会降低，能以此为基础选择再就业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社会资本与渔民退捕意愿呈正相关性，显著性极强。主要是因为渔民社会资本越高，意味着渔民社会资源关系越多，信息获取的渠道就会越多，社会交际关系就会越丰富。良好的社交关系和丰富的信息资源，使渔民选择再就业的机会更多，对退捕的认识也更加充分，渔民自愿参与退捕的意愿就会越强。

自然资本与渔民退捕意愿呈负相关性，显著性极强。这主要是因为渔民生计对自然资本的依赖性大。当自然资本减少，渔民获取的鱼类资源减少，而靠捕鱼获取利润的渔民因为收入减少，不得不选择其他途径获得收入，以维持生计。相反，当自然资本充足时，渔业资源比较丰富，渔民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对捕鱼的依赖性就会更大，选择退捕寻找替代生计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更多的渔民会选择继续捕鱼维持生计的可能性增加。

金融资本与渔民退捕意愿呈负相关性，显著性极强。这主要是因为渔民掌握的金融资本低，意味着渔民收入少、筹备资金的渠道少，导致渔民另选策略获得收入，维持生计。当渔民收入多、筹集资金的渠道多，渔民就会一直依赖捕鱼，不愿意选择另外的策略。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鄱阳湖区鄱阳县和余干县 228 户渔民的实地调研，采用 DFID 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渔民生计资本进行定量评估，并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渔民退捕意愿与生计资本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调查和计算得出渔民生计资本总值达到 1.6966，渔民的 5 种生计资本相差较大，其中自然资本（0.4347）最高，社会资本值（0.2289）最低。

第二，各地区的渔民的退捕意愿差距很大，其中鄱阳县莲湖乡自愿退捕的比例（64.3%）最高，余干县康山乡的不愿退捕的比例（87.5%）最高。

第三，研究发现渔民不愿退捕的比例高于自愿退捕的比例，且渔民生计资本对退捕意愿有显著影响。渔民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退捕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对退捕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作为自身发展的动力，而渔民在这些方面表现乏力，渔民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低、社会关系网络弱等劣势严重制约了渔民的转产转业能力，影响了渔民的退捕意愿。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的典型，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举措。^[19]自国家提出长江流域禁捕以来，国家和地方层面针对妥善解决禁捕后渔民的可持续生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形成了“国家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取得了积极成效。

江西省重点水域退捕渔民主要集中在鄱阳湖周边，存在渔民群体大、捕捞历史久、纠纷矛盾多、水域权属复杂等现实困难。江西省在财力总体偏弱的情况下，聚焦“禁得住、退得出、能小康”总体目标，攻坚克难、创新举措，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解题思路，兜牢退捕渔民各项民生保障，实现了渔民全面退捕上岸的阶段性胜利。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是事实优先，实现分类管理。我省根据户籍性质、收入来源、土地资源占有等情况，在尊重事实捕捞的基础上，界定了专业渔民、兼业渔民和其他渔民“三种身份”，并根据三种身份确定相应的安置保障补助标准，既保障了专业、兼业渔民利益，又兼顾事实“生计型”渔民权益。二是限高保底，实现老有所养。在全国率先出台《渔民基本养老指导意见》，成为全国相关文件的样本。设计了两种身份、两套标准、每户两人、可自由选择两个险种的保障措施。三是多措并举，实现转产就业。大力实施转产就业“1131”计划（即为退捕渔民至少提供 1 次政策宣讲、1 次就业指导 and 3 次职业介绍，并确保退捕渔民至少可选择 1 门实用技能参加培训），全力帮助退捕渔民转产上岸。举行退捕渔民专场招聘活动 179 场次，提供职业介绍 6.69 万人次，对首次创业的退捕渔民，给予 5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去省外务工的退捕渔民给予每人 500 元交通补贴，到省内跨县（市、区）务工的给予每人 300 元交通补贴。整合农村综合改革和渔业燃油补贴资金 4100 余万元，支持 75 个退捕渔村发展集体经济，带动渔民在“家门口”就业。开发 2200 多个公益性岗位，帮助就业困难渔民实现较稳定就业。四是兜牢底线，实现上岸无忧。将退捕渔民纳入社区管理，统筹做好住房修缮、子女教育以及健康医疗等工作。为退捕渔民发放为期一年的过渡期生活补贴，专业渔民 12000 元/户，兼业渔民根据各县财力，不超过专业渔民的补助标准。将符合条件的 2784 人名退捕渔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对 354 名困难渔民及其家庭成员开展临时救助，发放救助金 33.06 万元。

做好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工作是推进长江禁捕工作顺利实施的重中之重。各地各部门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还存在部分退捕渔民尚未转产就业，部分已转产退捕渔民就业稳定性不高，收入较低以及就业后再次失业等问题。从生计资本对鄱阳湖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看，后期可以从以下方面有效提升渔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实现退捕渔民上岸就业有出路、可持续生计有保障。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依托当地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稻渔（虾）综合种养、池塘养殖，以及畜禽养殖、蔬菜水果种植、园林花卉培育等乡村产业，拓宽退捕渔民就业渠道。同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乡村休闲旅游、休闲渔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按规定参与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增强发展能力的同时提高吸纳退捕渔民就业能力。二是落实惠农政策，加大创业扶持。进一步落实税费减免、场地安排、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一

次性创业补贴和创业培训等支持政策, 优先安排入驻返乡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鼓励、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退捕渔民通过组建家庭农场、家庭渔场或者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参与农业组织化生产经营。鼓励退捕渔民创办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快递物流、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三是开展政策宣讲, 加强技能培训。多渠道、多角度加强政策信息和涉农法律法规宣传, 及时将政策信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渔民普及, 让渔民能够在了解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自愿退捕, 并积极参与到针对性技能培训当中。同时也要坚持市场导向, 根据退捕渔民实际, 合理设置培训内容, 量身定制培训方案, 突出急需紧缺实用技能培训, 特别是适合渔民的水产养殖、水产加工、水上运输等培训, 力争使有培训需求的退捕渔民至少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四是开发公益岗位, 予以兜底安置。统筹开发农村环境卫生、巡护、保洁、保绿、保安等各类公益服务岗位, 优先保障大龄困难退捕渔民和零就业家庭退捕渔民及时上岗。例如, 可发挥退捕渔民熟悉水情鱼情优势, 组建规划适度、架构合理的协助巡护队伍, 满足十年禁捕新形势新任务需要, 有效保障禁捕水域秩序等。

参考文献:

- [1]刘龙腾, 易智慧, 刘子飞, 杨文波, 邓伟.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渔民退捕需要面对的若干问题——基于洞庭湖区湘阴县和汉寿县实地调研[J]. 中国渔业经济, 2019, (4).
- [2]蒙古军, 艾木入拉, 刘洋, 向芸芸. 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2).
- [3]宋香. 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户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河北省冀州区为例[D]. 石家庄: 河北经贸大学, 2017.
- [4]Paul Sudipta et al. Development of An Indicator Based Composite Measure to Assess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of Shifting Cultivation Dependent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Disadvantageous Northeastern Region of India.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0, 110(C).
- [5]吕建华, 郑洁. 对我国围海造地管理中失海渔民利益补偿问题的探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3, (6).
- [6]朱晓莉, 杨正勇. 上海淀山湖水源保护区渔民转产转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08, (3).
- [7]鲍谦, 黄硕琳. 我国渔民“失海”问题的研究[A]. 中国水产学会. 渔业科技创新与发展方式转变——2011年中国水产学会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C]. 厦门: 中国水产学会, 2011.
- [8]鲍谦, 黄硕琳. 中国渔民“失海”现状的分析研究[J].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2, (9).
- [9]殷文伟, 陈静娜, 李隆华. 沿海失海渔民补贴政策之效果研究[J]. 中国渔业经济, 2008, (2).
- [10]张兴祥. 城乡一体化与失地农民、失海渔民的转移就业问题——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J].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2011, (6).
- [11]赵景辉, 杨子江, 曾省存, 姜秉国. 我国渔民增收机制探讨[A]. 中国水产学会. 渔业科技创新与发展方式转变——2011年中国水产学会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C]. 厦门: 中国水产学会, 2011.
- [12]董晓清. 沿海开发背景下失海渔民可持续生计的困境与构建路径——以江苏省沿海开发为例[J]. 江西农业学报, 2013, (3).

-
- [13]Chambers R. The Origins and Practice of Participatory and Rural Appraisal. *World Development*, 1994, 22(7).
- [14]Cramb, R. A, Purcell T, Ho, T. C. S.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of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Central Highlands of Vietnam. *Agricultural System*, 2004, 81.
- [15]朱利凯, 蒙吉军, 刘洋. 农牧交错区农牧户生计与土地利用: 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1).
- [16]高云峰. 信息熵权法在管理决策研究中的应用[J].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 2015, (3).
- [17]韦惠兰, 祁应军.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河西走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外围为例[J]. *中国沙漠*, 2016, (2).
- [18]许燕, 施国庆. 失海渔民可持续生计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 [19]刘子飞, 韩杨. 长江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政策: 目标、进展与建议——基于长江禁捕典型省域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8).